



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儒风兴起: 惠州文气从“进口”到“自产”

隋代开始,来自中原地区的官员便不断影响惠州儒学风气,至唐宋则为兴盛期。在他们的推动下,惠州文化教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到了南宋,惠州书院讲学之风兴起,人才辈出。以理学家罗从彦为首的名儒们在罗浮、西湖的书院讲学,在岭南播下了宋代理学的首批思想种子,为开启惠州文化教育一代新风立下大功。明朝杨起元有言:“尧封禹服原千古,风气人文又一番。”至此,惠州这一座“梁化旧邦”的衣冠文物已几乎与中原无异。

壹
岭南儒学兴起不晚于西汉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各级官办学校是传播儒家文化,培养国家管治人才的主要教育机构。岭南教育与中原相比发展较晚,何时开始兴办学校尚难确定。但至迟在西汉后期,儒家文化已在岭南逐步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岭南士子积极进取,跻身封建官宦集团,进一步促进了岭南社会的汉化过程,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惠州地处粤东,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开发较之粤中相对迟缓。加上入隋之前惠州行政隶属和郡县废置迁变频繁,相关史籍失缺纷乱,就目前掌握

的资料看,
直至隋代才
有官员在惠州兴办学校、
推行儒家教育,隋文帝重
臣柳机之弟、龙川太守柳
旦正是始作俑者。

据《隋书·柳机传》载,
当时郡中“民居山洞,好相
攻击,(柳)旦乃为设学校,
大变其风。(隋场)帝闻而
善之。”这是史籍中关于惠
州官府兴办儒学以教化社
会、改变民风的最早文字
记载。此后,唐宋两代都有
大批官员在惠州兴文助教,
开始了儒家文化在惠州传
播的新篇章。

隋唐以前的选官制度,是“两汉举孝廉,两晋重门第”。至隋朝,开始用考试的方法取士,以考卷为标准,重视真才实学,不再考虑出身门第和德声名望,开创了一条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的新路。明经承隋制,增设秀才、明经诸科而仍以进士科为重。

唐太宗重振儒术之后,岭南地区的各级官员,大都是重儒崇教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肩负着用儒家学说治教一方百姓的政治责任,也有力地提振了惠州儒学教育的水平。

据有关学者统计,唐
代自“安史之乱”后,全国

进士总数为713人,而从
唐长庆四年(824年)到乾
符四年(877年)约五十年
间,惠州就有三人考中进
士,即韦昌明、郑隐和张昭
远,其中韦昌明所作《越王
井记》是现存最早的惠州
文章。

这3名进士,虽然仅
占同期全国进士总数的
0.42%,如果以全国平均
水平来衡量,仍不算很落
后。就广东地区而言,唐
代中进士者38人,惠州
3人,占7.89%,亦远高
于全省25州的平均水平。
若与自身作纵向比较,
更是零的突破,很有
象征意义。

唐末,黄巢入粤攻掠潮、循二州,唐王朝丧失了对岭南的管治权,群雄争粤,南汉最终获胜。起初,南汉政权重视儒教,按唐制设学校、立科举,躲避战乱的中州人士争相迁至岭南;然而,南汉内部很快陷入斗争,政权暴虐,文化教育乏善可陈,所幸时间不长。宋开宝四年(971年),赵匡胤平南汉,惠州地区归入宋朝版图,文气始兴。

宋代重文轻武、以文制军,朝廷重用儒臣,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进士须通经义,遵循孔之礼”。当时普遍采用的儒学开蒙教材《神童诗》中的第一首诗即毫不掩饰地宣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获得

统治阶级进一步的确认,
而科举考试制度也更趋完善。

各州县都设有儒学,委任学官主管地方教育,特别是经过北宋的三次兴学运动,“学校之设遍天下”;合并简化考试科目,以三年一试为定制,考试分州试、省试、殿试三级,通过殿试的方式把省试合格的考生变为“天子门生”,提高进士的政治地位;扩大取士名额,只要通过殿试,不管合格与否,全部录取安排官职以广纳人才。

到南宋,广东全部州学、过半县学相继创立。惠州1州5县(含龙川)先后兴办州学1所,县学3所。陈尧佐、苏东坡、唐庚、刘克庄、杨万里、李纲、文天祥等一批优秀的官员、学者、诗人相继踏足惠州,更令惠州“风气人文又一番”。

儒学的兴办,改变了唐代和宋初偏重科举考试而忽视学校教育导致的人才不振。据清光绪《惠州府志·选举表》统计,宋代惠州各县录取进士54人,诸科13人。其中,归善为州治之所,亦为州学所在地,全县至宋室南渡前后共考取进士6人,都是出身于府(州)学,可见官学在惠州儒学教育中已发挥重大的作用。进士留正更是官至右丞相,历孝、光、宁宗三朝,被孝宗称为“真宰相”,是宋代惠州儒学代表者。

有学者指出:“宋代广东共有州县学63所,书院41所,其中较多的就是广州、惠州。”

宋代地方官对中央政权文教大政策往往有较好的理解和把握,大都能把恢复和兴办学校作为振兴一方的重要政务,这是惠州文化教育在宋代获得长足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嘉靖丙辰《惠州府志》中就有大量宋代各级官员在惠州兴学的记载,最早在惠州兴办书院的罗从彦(博罗县簿)、赵汝馀、刘克刚(均为惠州知州)等,均是任职惠州的朝廷命官。

这批惠州地方官员以振兴地方文教为己任,或募集资金创辟书院,或择地开基兴建学校,或兼选贤能以充师儒,或亲主教席训守诸生,为惠州教育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如约鳌书院的始创者罗从彦,在讲学途中病死于客舍,竟因家贫而数年不得归葬;又如惠州知州刘克刚,始创丰湖书院,在病重将死前夕仍记挂着书院的发展,把主管教育事务的官员叫到床前,再捐善钱千缗以增建学舍。他们以身垂范,为发展惠州文化教育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除官学外,南宋惠州大兴书院,设席讲学者亦多为名儒硕学,如约鳌书院的罗从彦“潜思力行,任重道远,士之游其门者甚众”,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就是他的再传弟子。讲学于张留书院的留正和张宋卿,也是德才兼备、位致通显的栋梁之材。这些优良的师资,是惠州文化教育在宋代获得长足进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惠州籍宰相留正
忠宣王公遗像

文/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贰
晚唐时本土进士显著增加

惠州是岭南儒学主要发源地之一



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羊城晚报:为何儒家文化在惠州(岭南)地区的发展如此之晚?

包国滔:隋唐以前,较惠州(岭南)地区而言,中原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都较快,当时都称惠州(岭南)地区为蛮荒之地,部分到此任职的官员,或是得罪上级,或是犯了错误,多有贬谪之意。隋朝的柳述以及宋朝的苏东坡都是典型的例子。

由于当时交通工具不发达,岭南与中原地区的往来交流较少,儒家文化主要在中原地区传播,儒学传播需要通过教育来进行,但当时岭南地区生产力比较落后,并非人人都可以上学受教育。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奠定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的基础。儒家文化如何在惠州(岭南)传播开来,又何时达到鼎盛?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特地专访了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包国滔。

羊城晚报:根据您的研究,隋唐以前惠州(岭南)地区的儒家文化氛围如何?

包国滔:就现有的研究而言,隋唐时期岭南地区特别是惠州市,较为流行的是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由于当地生产力水平较低,道家、佛教提倡的虔诚信仰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与之相反的是,儒家所提倡的礼乐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不相匹配,故儒家文化在岭南地区发展较晚,至于何时开始兴办学校,尚难确定。

但至迟在西汉后期,惠州民间办学逐渐兴起,这里是岭南地区儒家文化主要发源地之一,越来越多的士子积极进取,跻身封建官宦集团,进一步促进了这两地的汉化过程,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奠定儒家思想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的基础。儒家文化如何在惠州(岭南)传播开来,又何时达到鼎盛?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特地专访了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副教授包国滔。